·科学技术文化研究·

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双加工理论由静变动的枢轴

The Situational Concerns of Other Mind Access: The Pivot of Dual Process Theory from Static to Dynamical

李中良 /LI Zhongliang

（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1)

摘　要：双加工理论（DPT）的平行结构面临着哲学家的批判和认知科学实验结果的责难。围绕他心通达机制，层见叠出了理论论（TT）、模拟论（ST）、叙事理论（NT）和直接社会感知理论（DSPT）等理论。它们对他人身处情境的关切可分成意识关切进路和无意识关切进路。借助署名限制将两条进路分别归入加工1和加工2。根据可塑性假设，意识关切进路可转化为无意识关切进路，加工2可转化为加工1。加工2到加工1的转化成为两者实现信息交流的另一种模式，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批判和容纳现有认知科学实验结果，而且使得加工2和加工1不再是静态孤存的，而是可动态转换的。由此，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成为DPT静变动的枢轴。

关键词：他心　双加工理论　署名限制　情境关切

Abstract: The parallel structure of Dual Process Theory has faced criticism from philosophers and the results of cognitive science experiments. Around the mechanism of other mind access, theories such as Theory Theory, Simulation Theory, Narrative Theory and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Theory have been proposed. Their concern about the situation of others can be divided into conscious concern routs and unconscious concern routs. The signature limit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two routes into processing 1 and processing 2. According to the plasticity hypothesis, the conscious concern rout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unconscious concern routs, and processing 2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processing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cessing 2 to processing 1 becomes another mode of information flow between the two, which not only can cope with criticism and well accommodate the results of existing cognitive science experiment, but also makes processing 2 and processing 1 no longer exist in static isolation, but can be dynamically transformed. Thus, the situational concerns of other mind access become the pivot of Dual Process Theory from static to dynamical.

Key Words: Other mind; Dual process theory; Signature limits; Situational concern

中图分类号：N031; G0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06.013

阿珀利（I. A. Apperly）和巴特菲尔（S. A. Butterfill）提出的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以下简称DPT）主张，行动者（agent）会在通达他心的过程中使用两种加工：有效加工（efficient processing，以下简称加工1）和灵活加工（flexible processing，以下简称加工2）。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多维视野下的读心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3DZXJ03）。
收稿日期：2022年1月15日；**返修日期：**2024年4月22日
作者简介：李中良（1988–）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哲学心理学。Email: andyliuchaowei@126.com

[1]然而，它自提出至今，一直饱受批判。其中一项批判针对的是，DPT倾向于承认加1工是信息封装的（information encapsulated），它和加工2构成平行结构。[2]为了对DPT予以完善，本文内容做如下安排：第一，剖析DPT平行结构的困局；第二，归纳他心通达机制理论关切情境的两条进路；第三，借助阿珀利和巴特菲尔提出的署名限制，把两条进路分别归入加工1和加工2中；第四，根据可塑性假设，以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为枢轴，将DPT由静态孤存改造为动态转换。

一、DPT的平行结构

DPT倾向于承认加工1是福多（J. Fodor）的输入系统（input system）或传感后机制（post-transductive mechanism），具有信息封装的模块性（modularity）。根据福多的观点，信息封装是“输入系统的确认功能并不能接触到机体内部所表征的全部信息；内部表征信息在输入加工中的分配是受限制的”。[3]简言之，加工1是信息封装的，指它与加工2构成平行结构，两者缺乏信息交流。但是，这种观点既不能解释婴儿在非言语版错误–信念任务①中展现出的灵活性，也与已有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相龃龉。

围绕非言语版错误–信念任务开展的诸多实验表明，婴儿在通达他心时，加工2和加工1存在信息交流，换言之，他心通达是加工2和加工1合作的结果。[2]克里斯滕森（W. Christensen）和迈克尔（J. Michael）对此总结到：“这些研究不仅说明了婴儿识别和归与目标的灵活性，而且更普遍地表明，婴儿可以灵活地将对行动者的目标表征和信念表征、观察到的行为以及环境机会（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整合起来。综上所述，来自这些研究的证据表明，婴儿以一种比巴特菲尔和阿珀利更清晰的方式表征目标，这包括对情境、行动和行动者的多方面的灵活敏感性”。[2]

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以下简称OC）是一个专门系统，它在决定动作结果的诱因价（incentive value）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有证据表明，OC可根据任务要求灵活地与其他系统——基底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和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进行信息交流。[4]与基底外侧杏仁核的相互作用有助于确定结果的诱因价；在要求快速的和灵活的抽象任务中，OC也可与海马体旁区相互作用。因此，OC表明一个专门的系统也可以利用广泛的信息来源展示复杂、灵活的信息处理。在阿珀利和巴特菲尔的观点体系中，加工1也是一个专门系统，主要负责对类信念（belief-like）或登记（registration）的表征。但是，正如OC所表明的，加工1也会与高级的认知系统（加工2）产生信息交流。恰如认知神经科学家葛詹尼加（M. S. Gazzangia）所言：“神经科学家偏爱用网络方式来解释大脑区域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局限于一种严格的定位方式。像推测他人心理状态这样复杂的心理过程是不太可能由单一的脑区支撑起来的。”[5]

由上可知，加工1是信息封装的，并不符合心理学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的研究结果。合理的阐述应该是，加工1是认知渗透（cognitive penetration）的，它与加工2存在信息交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成为，加工1和加工2如何实现信息交流？一种模式是，加工1和加工2分别恒久对应大脑中特定的神经生理结构，且一直各司其职，即加工1和加工2在结构和功能上是恒定不变的，两者以自上而下

①由维默尔（H. Wimmer）和佩尔奈（J. Perner）创立的错误–信念任务，又称言语版错误–信念任务、标准错误–信念任务、诱导–反应（elicited-response）错误–信念任务。这类任务以被试的“准确言语回答”为标识来判断被试具有他心通达能力。后来，又有一类任务以被试的“内隐行动反应”（注视时间、第一次扫视方向等）为标识来判断被试具有他心通达能力。这类任务被称为非言语版错误–信念任务或自发–反应（spontaneous-response）错误–信念任务。非言语版错误–信念任务又可以分成期望违背（violation of expectation）范式、预期注视（anticipatory looking）范式和和互动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al）范式。

或自下而上的方式互惠（reciprocally）交流。本文提供了另外一种信息交流的模式——加工2可以转化为加工1。“加工2转化成的加工1”是加工1和加工2信息交流的产物，兼具加工1和加工2的特点，既是有效的，又是灵活的。因此，在“加工2转化成的加工1”那里，有效性和灵活性实现了融通，见证了加工1与加工2的信息交流。

那么，加工2是如何转化为加工1的呢？它可以围绕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这一枢轴来实现。具体论证思路如下：

前提1：意识关切进路属于加工2，无意识关切进路属于加工1；

前提2：意识关切进路可转化为无意识关切进路；

结论：加工2可转化为加工1。

二、意识关切进路和无意识关切进路

人类的认知无法做形而上学式的表达，因为它只能是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认知。例如，嵌入认知（embeded cognition）就主张认知过程发生在情境中，认知过程通过与情境的功能协作而得到简化。[6]他人的认知，甚至是他人的心灵，都必定是嵌入于情境之中的。普特南（H. Putnam）就认为，不涉及开放式的情境，信念和愿望就无法得到说明，因为“环境本身在决定一个说话者或一个群体的话语所指代的内容方面发挥着作用。”[7]因此，行动者在通达他心的过程中，必须要关切他人身处的情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本文把“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界定为，他心是嵌入于作为整体的情境结构中的，行动者在通达他心的过程中会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考虑，与他人心理上（而非事实上）相关的情境结构的要素。既然他心通达是情境关切的，那么他心通达机制理论必须将情境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构建之中。关于他心通达机制理论，层见叠出了理论论（Theory Theory，以下简称TT）、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以下简称ST）、直接社会感知理论（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Theory，以下简称DSPT）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以下简称NT）等。那么，在TT、ST、NT和DSPT的理论表述中，情境关切分别采取的是何种进路呢？

1. ST和NT的意识关切进路

TT主张行动者会根据一套大众心理学理论，即一张心理之因与行动之果编织而成的因果关系网，来前向回溯他心（解释）或后向预期他人行动（预测）。正如TT的重要代表人物高普尼克（A. Gopnik）所说：“该理论组织了他们对心理生活现象的解释，并提供了一种世界如何告知心智和心智如何指导行动的因果解释的理解。”[8]依据TT的说法，行动者是依据一套高度概括化的理论去通达他心，而他心的嵌入情境在TT的理论表述中被“抽象消融”了。

TT的高度概括化导致了对情境关切的背离，掩盖了他心通达过程的诸多细节。恰如加拉格尔（S. Gallagher）所言：“知道一个理论，或有一般的知识本身，或只知道一套规则这些都不够，因为一个人必须知道何时、何地和谁等，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与细节有关。”[9]将TT和情境关切统一起来的道路只能是，TT降低抽象程度以容纳对情境的关切。而接收情境并使之成为理论构建的要素，则必然要降低TT本身的抽象程度，致使其变为概括化程度较低的NT。

NT的主要倡导者是胡图（D. D. Hutto）。他在批判TT过度抽象和迷恋普遍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叙事实践假设（narrative practice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在他人的帮助下，大众心理学叙事（folk psychology narratives）——对大量涉及命题态度的情境化故事的叙述是行动者获得大众心理学的必要途径，因为“叙事展示了主要角色的心理态度（psychological attitudes）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以及心理态度与其他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s）相互作用的方式。这样的故事也展示了这样的心灵状态（mental states）是如何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历史和更远大的计划中”。[10]释言之，叙事构成了大众心理学能力的基础，它使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使用已知的故事框架去

套解他心。胡图进一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叙述都能成为叙事，叙事必须是用复杂的语言表征描述（非逻辑的）相关事件的特定时间序列，其中的事件必须包括行动，而行动的原因必须涉及最低限度的信念和愿望。[10]事件通常都是包括情境的，也就是说，叙事乃是大量情境化故事的集合。通过大量情境化故事的叙述，行动者的叙事能力得到加强，并成为解释和预测他人行动的参考。叙事助推的他心通达过程会关切他人的身处情境，NT的情境关切在此显露无疑。

ST认为行动者会假装身处他人所处的情境，并在此基础上通达他心。早在18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在论述同情时，就已经对此做过精彩的阐述："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种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11]展开来讲，ST包括三个依次展开的步骤：第一，行动者创设与他人相匹配的假装状态；第二，借助假装状态，将他人的信息输入到行动者自身的心理机制中，并利用该机制对信息输入进行离线（offline）操作，输出一种或多种结果；第三，将输出结果投射给他人。创设与他人相匹配的假装状态是第一步，它影响着后续步骤的展开。而要与他人状态成功匹配，行动者必须假装进入他人身处情境。在这里，情境虽然不是行动者的真切经历，但行动者要做到感同身受，只有如此才能够创设匹配的假装状态。由此可知，ST对情境的关切是赤裸裸的，其理论表述中"散发着情境所释放的芬香"。

当行动者使用叙事或假装–投射去通达他心时，很显然是关切他人身处情境的，而这种关切显然又是有意识的。基于此，本文把ST和NT对情境的关切进路称为意识关切进路。它指在通达他心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关切他人身处情境。

2. DSPT的无意识关切进路

DSPT主要由加拉格尔倡导，他收到了斯托特（R. Stout）、扎哈维（D. Zahavi）和克鲁格（J. Krueger）的积极回应。DSPT反对他心不可观察的原则，主张行动者可以直接感知他人的情绪、意图等心理状态。乍看上去，DSPT没有给他心的嵌入情境留任何位置，即它是非情境关切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对DSPT的描述有全人层面（personal level）和亚人层面（sub-personal level）两种方式。[12]在全人层面，DSPT指的是行动者借助他人的表情、动作瞬间直通他心，整个过程无需推理的参与。这很容易使人形成如下直觉：情境关切压根儿来不及参与这场维特根斯坦式或梅洛-庞蒂式的"感知快闪"。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行动者在直接感知他心时，没有意识到自身关切过情境；第二，情境关切会耗费时间，这与直接感知他心的快速性相冲突。那么亚人层面对DSPT的描述，是否表明了行动者对情境的关切呢？下文会通过论证指出，亚人层面对DSPT的描述暗含着，行动者在直接感知他心时会关切情境，只是这种关切是感知性质的，是无意识的。基于此，本文把DSPT对情境的关切进路称为无意识关切进路。它指在通达他心的过程中无意识的关切他人身处情境。

三、DPT视角下两条关切进路的诠释

围绕他心通达机制，出现过诸多版本的双加工理论，"但阐述最清楚且对他心通达领域产生最大影响力的是阿珀利和巴特菲尔提出的DPT"。[13]"人类具有追踪信念和类信念的双系统吗？"是DPT的开山之作，在这里，阿珀利和巴特菲尔把通达他心的过程分成加工1和加工2两种，并进一步指出，加工1是认知有效的、早期发展起来的、不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加工2是认知灵活的、晚期发展起来的、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1]"如何建立最小心智理论"是DPT的顶峰之作，在这里，巴特菲尔和阿珀利又指出，加工1是自动的、加工2是非自动的。[14]由此，构成了加工1和加工2的四项区别：认知有效VS认知灵活、早期发展VS晚期发展、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VS不

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自动的VS非自动的。这四项区别也成为判断某种过程属于加工1还是属于加工2的四项标准。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无意识认知过程是自动的、不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有意识认知过程是非自动的、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恰如阈下感知和阈上感知，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所表明的。根据这个逻辑，无意识关切进路在将情境纳入其中后，其描述的他心通达过程就是自动的、不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意识关切进路在将情境纳入其中后，其所描述的他心通达过程就是非自动的、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再根据认知资源耗费和自动化两项标准，无意识关切进路应该属于加工1，意识关切进路应该属于加工2。下文将以此为研究假设，借助阿珀利和巴特菲尔提出的署名限制对其予以检验。

阿珀利和巴特菲尔总结了已有的数量表征研究，并指出婴儿的数量表征能力有准确和笼统之分。举例来说，婴儿可以在两组间做精确数量鉴别，但两组的项目数量必须都是3个或4个以下；婴儿也可以在两组间做笼统数量鉴别，但两组项目数量的比率要大于2。此即婴儿数量表征的署名限制。它在成年期也依然存在，例如成年被试在被要求快速判断或其计数能力被同时进行的其他认知任务干扰时，他们的数量表征也表现出署名限制。

遗憾的是，阿珀利和巴特菲尔没有给出署名限制的明确界定。在他们的阐述中，署名限制所浮现出的意蕴是，在效率与灵活的权衡中，为了追求效率而以牺牲灵活为代价。究其本质而言，署名限制就是认知能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受限的认知能力只得在此范围内工作，一旦超出此范围便力所不及。他们把署名限制当做区分加工1和加工2的标准，“署名限制为加工数字（以及密切相关的功能）的不同系统和在人类婴儿、成人和非人类动物中存在的与数字加工系统相近的诸多系统提供了关键证据”。[1] 并进一步指出，加工1具有署名限制，加工2不具有署名限制。因此，如果无意识关切进路具有署名限制，而意识关切进路不具有署名限制，那么前者就属于加工1，而后者就属于加工2。

作为无意识关切进路，DSPT主张“我们在他人的‘具身举止’（embodied comportment）中直接感知到他人的行动、反应、意图和情绪，具身举止包括姿势、动作、面部表情、眼睛定向、手势、语调以及说话方式”。[16] 对DSPT的一种哲学解释是构成解释（constitutive account）。构成解释通过重塑心灵的形而上学，主张行动是心灵的表达性构成，行动是具有表达性质的，可以通过观察行动而直通心灵。[17] 它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卡尔纳普（R. Carnap）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要建立一个构造系统，即一个按等级次序排列的概念或对象的系谱。在这个构造系统中，从低到高分成四个层次，分别是自我心理的对象、物理的对象、他人心理的对象和精神的对象。他人心理的对象是被如此构造出来的：根据自我心理的对象构造出作为物理对象的自我的身体；我的身体被当成“人”的类，而我的身体之外也属于这个类的“其他的人”构造成一个对象种类——他人的身体；他人身体与他人心理具有表达关系，“所谓表达关系是指表达活动，即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乃至感官的过程，与‘表达’在这些表达活动中同时的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18] 借助这一关系，可根据他人身体构造出他人心理的对象。

根据构成解释，具身举止是心灵的表达性构成，具有表达性质，它也因成为通达他心的载体而具有了认识论意义。但是，很难说具身举止承载着情境意义。在梅洛–庞蒂说出“愤怒、羞耻、憎恨和爱并不是隐藏在他人意识深处的心灵事实：它们是从外部可见的行为类型或举止风格”[19] 时，这里的愤怒、羞耻、憎恨和爱是一般性质的，而不是植根于具体情境下的特殊性质的。虽然加拉格尔对具身举止予以完善，把它改造成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语用语境和社会情境中”[20] 的，从而试图把“对情绪、意图的直接感知”改造成“对发生在具体情境中的情绪、意图的直接感知”，但直接感知能力是有限的，它很难在快速直通他心的同

时又充分考虑情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很多时候行动者可以看到他人的表情，但却不能直通他人的意图或情绪，即DSPT失效了。而DSPT之所以失效是由于它很难在快速“穿透”一张面孔的同时又充分考虑面孔的嵌入情境。DSPT具有快速直通他心的能力，但它又受到不能充分考虑情境的限制，即出现了署名限制。

DSPT的署名限制还表现在它只能直通意图和情绪等少数低阶心理状态，至于信念、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高阶心理状态为其力所不逮。即使加拉格尔也声称“我们不能主张我们能看到他人的信念或思想”。[20]总结起来，DSPT的署名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直通范围有限；其二，在有限的直通范围内不能充分考虑情境。DSPT虽然具有署名限制，但却可以在不需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情况下直通他心。这与加工1虽然缺乏灵活性，但却不受认知资源束缚的特征是相同的。

署名限制是认知能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受限的认知能力只得在此范围内工作，一旦超出此范围便力所不及。从中可知，署名限制的典型表现是不能够启用大量的认知资源。如前所述，署名限制自婴儿阶段便存在，并延续至成年阶段。但是，这两类群体产生署名限制或导致不能够启用大量认知资源的原因是迥异的。就婴儿来说，他们的长时记忆、工作记忆、概念理解、执行控制和言语表达等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认知资源本然稀缺。即使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也难以启用大量的认知资源通达他心。而成年人已然具备了充足的认知资源，而他们的某些他心通达过程之所以不能够启用大量认知资源主要出于以下两种原因：第一，正在完成的某任务耗费了大量认知资源，挤压了同时进行的他心通达过程可启用的认知资源空间；第二，启用大量认知资源的必备条件是时间充足，但某些他心通达过程是快速的，由此导致大量认知资源无暇启用。DSPT署名限制的产生原因就是第二种情况。在DSPT那里，表情、手势、动作等的观察与情绪、意图的通达是同时的，DSPT直通他心在电光火石之间，快速的他心通达过程无暇启用已有的大量认知资源，致使其得之快速却失之灵活。作为意识关切进路，NT、TT是对成年人在未被干扰情况下的他心通达过程的机制阐释，隐含可启用的认知资源空间未被挤压的假设。此外，它们还默认他心通达过程不受时间的限制。意识关切进路巧妙避开了不能够启用大量认知资源的各种“陷阱”，从而能够提取长时记忆、利用工作记忆、使用概念、调用执行功能和组织语言，即不再具有署名限制，由此归入加工2的阵营。

由上，前提1被证实。

四、意识关切进路到无意识关切进路的转化

意识关切进路到无意识关切进路转化的论证，可从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以下简称MN）的讨论中切入。MN是这样一类神经元，它在动作执行和动作观察阶段均被激活。加莱赛（V. Gallese）在MN的基础上提出了具身模拟（embodied simulation）理论。他认为MN的激活足以直接捕获动作意图，而无需高级认知过程的参与，即“不需要假设一个‘首要的’（over-arching）自上而下的影响，就可以拥有一个映射目标的神经机制。”[21]但是，莱威尔（J. S. Lavelle）却认为MN仅起到动作表征的作用，不能够直接捕获动作意图。为此，她提出了经典三段论式的大脑运行过程：

条件1：在顶叶镜像区域产生动作表征；

条件2：在其它大脑模块（以命题的形式）表述的关于文化实践或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表征（knowledge representations）；

结论：大脑通过计算这些表征，做出关于他心的最佳解释。[12]

在这里，MN仅起到动作表征的作用，他心通达的关键是关于文化实践或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表征。根据莱威尔的经典三段论式的大脑运行过程，意识关切进路应该做如下描述：

条件1：感知器官接收包括情境在内的各类信息，并在大脑低级皮层结构（感知神经系

统）予以表征；

条件2：在大脑高级皮层结构（认知神经系统）启用理论推理、假设模拟等方法；

结论：高级皮层结构对低级皮层结构的表征信息进行计算从而输出他心通达结果。

在这个三段论中，感知系统只起到信息输入的作用，认知系统的理论推理、假设模拟才是关键。但是，上述对意识关切进路的三段论描述是静态僵化的，它忽略了感知神经系统的可塑造性。正如加拉格尔对莱威尔的批判，她“忽略了感觉运动区域在先前经验中经历可塑修改（plastic modifications）的可能性。这种对大脑可塑性的轻待是对心智标准计算模型的退步”。[20]

可塑性假设认为，大脑和神经系统所具有的功能不是固有的（hardwired），它会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持续影响下，结构上由简单变得复杂，功能上由简单变得丰富。可塑性假设已被较为丰富的研究所证实。传统观点认为，V1是视觉皮层的最低级区域，它位于上行视觉通路的最外围位置，双眼信息在此处被整合，主要负责特征检测，即V1神经元的反应只与刺激的物理属性有关。而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颠覆了这一传统观点，认为初级视觉皮层（V1）的功能是可塑的。[22]他们让成年老鼠带上护目镜，然后给予其左眼或右眼0.4秒的视觉刺激，视觉刺激之后呈现奖励。结果显示，视觉刺激和奖励的联结，使得成年老鼠的V1中有相当一部分神经元的反应，从只针对刺激的物理属性，到能准确预测奖励时机。V1的这部分神经元不再只是对物理刺激的反应，而成为对物理刺激预示奖励的反应，实现了从低阶加工到高阶加工的蜕变。概言之，V1的这部分神经元因塑造而质变了。

新近兴起的文化神经科学也对可塑性假设做出了带有时代特色的印证。文化神经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既利用了心理过程文化差异性的科学证据，也利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借以理解文化、心智与大脑的相互作用。在一项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中，欧裔美国人和亚洲人在被同一张面孔启动的同时进行侧抑制任务（flanker task）。[23]结果显示，相比于欧裔美国人，亚洲人在面孔启动时表现出更显著的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即相比于欧裔美国人，亚洲人仅观看一张面孔图像就足以自动激活对这张图像所带来的威胁的评估。这表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文化神经科学的诸多研究都证实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被试会被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所“熏陶”，进而被形塑为不同的大脑结构、大脑回路和大脑激活模式，这成为心理过程文化差异性的根源。

以可塑性假设为前提，便可以得出“简单功能的感知神经机制→被实践经验塑造→丰富功能的感知神经机制”的逻辑链条。这正是加拉格尔所指出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亚人层面上，感知已经通过可塑性机制，被身体（生成）因素和情境（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先前经验所塑造”。[20]感知神经系统本来是负责作为低阶加工的接受和表征信息，但在实践经验的持续影响下，感知神经系统质变为能够开展高阶加工的新感知神经系统。加拉格尔将这种新感知称为巧感知（smart perception）。[24]巧感知可以感知高层次特征，可以在直通他人的情绪和意图时考虑他人的身处情境。在亚人层面上，情境考虑被纳入到感知神经系统之中。换言之，在亚人层面上，行动者在通达他心时，对情境的考虑不是感知外的推理过程，而是感知过程的一部分。情境考虑成为亚人层面所描述的DSPT的应有之意。因此，在亚人层面上，DSPT是关切情境的，只不过它是感知性质的，是无意识的。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将DSPT称为无意识关切进路的原因所在。

在意识关切进路中，感知系统提供信息输入，认知系统对包括他人身处情境在内的信息输入予以加工，从而输出他心通达的结果。意识关切进路所描述的他心通达过程会不断重复，造就诸多他心通达实践经验。而这些实践经验，在全人层面上，使得关切情境的他心通达过程越来越快速；在亚人层面上，塑造了旧

感知系统并形成新感知系统。新感知系统不再只负责信息的输入，而是能够将情境的考虑纳入其中，兼具了有效性和灵活性，或有效性与灵活性在此处得到融通。也就是说，被塑造成的新感知系统可以在无意识关切情境的情况下快速直通他人情绪和意图。而这正是无意识关切进路的内涵所在。因此，被塑造成的新感知系统步入了无意识关切进路的阵营，有意识关切进路实现了到无意识关切进路的转化。

由上，前提2被证实。如下结论便可获得：加工2可转化为加工1。

结　　语

DPT的平行结构面临着哲学家的批判和认知科学实验结果的责难。在这个时候，本文将目光投向一个被较少关注的问题——行动者通达他心过程与他心嵌入情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问题。首先梳理出他心通达机制理论情境关切的两条进路，然后借助署名限制将两条进路分别归入加工1和加工2。在可塑性假设的帮助下，意识关切进路实现了到无意识关切进路的转化，加工2实现了到加工1的转化。加工2到加工1的转化成为两者实现信息交流的另一种模式，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批判和容纳现有认知科学实验结果，而且使得加工2和加工1不再是静态孤存的，而是可动态转化的。当然，此转化是在讨论他心通达的情境关切时发生的，因此它成为DPT由静变动的枢轴。这里的转化犹如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从“事实的图像”转变为“在特定情境下基于语言规则的使用”，正如他所说的：“只有翻转一下我们的整个考察问题的方式，才能使那种关于晶体般纯粹性的成见得以消除（人们可以说：我们的考察必须反转，但是要转绕我们的实际需要整个枢轴来反转）。”[25]

阿珀利和巴特菲尔建立的DPT并未给予DSPT以足够重视。甚至，“DPT没有考虑到DSPT所倡导的对他人心理状态直接感知的可能性”。[26]无论加工1还是加工2都是表征，前者是类信念表征、后者是信念表征，而DSPT是非表征的。本文只是借助DSPT和加工1在署名限制方面具有的相同点，将DSPT归入加工1的阵营或将两者做整体处理，进而论证加工2到加工1转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加工1对DSPT的“收购”并不代表两者的同质，因为加工1和DSPT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差异。[27]

［参 考 文 献］

[1] Apperly, I., Butterfill, S. A. 'Do Humans Have Two Systems to Track Beliefs and Belief-likeStat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9, 116(4): 953.

[2] Christensen, W, D., Michael, J. 'From Two Systems to a Multi-systems Architecture for Mindreading'[J].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016, 40: 48–64.

[3] 杰瑞·艾伦·福多. 心理模块性[M]. 李丽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66.

[4] Schoenbaum, G., Setlow, B., Ramus, S. J. 'A Systems Approach to Orbitofrontal Cortex Function: Recordings in Rat Orbitofrontal Cortex Reveal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Systems'[J].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003, 146(1–2): 19–29.

[5] 迈克尔·葛詹尼加. 认知神经科学: 关于心智的生物学（第三版）[M]. 周晓林、高定国 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529.

[6] Rowlands, M.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9.

[7] Edelman, G. M.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224.

[8] Gopnik, A., Wellman, H. M. 'Why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Really Is a Theory?'[J]. *Mind & Language*, 1992, 7(1-2): 145–171.

[9] Gallagher, S. 'An Education in Narrative'[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4, 46(6): 600–610.

[10] Hutto, D. D. 'The Narrative Practice Hypothesis: Clar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J].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2008, 11(3): 175–192.

[11]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6.

[12] Lavelle, J. S. 'Theory-Theory and the Direct Perception of Mental States'[J].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2, 3(2): 213–230.

[13] Carruthers, P. 'Two Systems for Mindreading?'[J].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6, 7(1): 141–162.

[14] Butterfill, S. A., Apperly, I. A. 'How to Construct a

Minimal Theory of Mind'[J]. *Mind & Language*, 2013, 28(5): 606–637.

[15]Dennett, D. *Content and Consciousness*[M]. London: Routledge, 1969, 93.

[16]Gallagher, S. 'The New Hybrids: Continuing Debates on Social Perception'[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15, 36: 452–465.

[17]Forlè, F. 'Bodily Expressions, Feelings, and the Direct Perception Account of Social Cognition'[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20, 19(5): 1019–1034.

[18]鲁道夫·卡尔纳普. 世界的逻辑构造[M]. 陈启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275.

[19]Merleau-Ponty, M. *Sense and Non-sense*[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52–53.

[20]Gallagher, S., Varga, S. 'Social Constraints on the Direct Perception of Emotions and Intentions'[J]. *Topoi*, 2014, 33(1): 185–199.

[22]Gallese, V. 'Intentional Attunement: A Neuro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Cognition and Its Disruption in Autism'[J]. *Brain Research*, 2006, 1079(1): 15–24.

[22]Shuler, M. G., Bear, M. F. 'Reward Timing in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J]. *Science*, 2006, 142(1): 1606–1609.

[23]Kitayama, S., Park, J. 'Cultural Neuroscience of the Self: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Grounding of the Brain'[J].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0, 5(2–3): 111–129.

[24]Gallagher, S. 'Direct Perception in the Intersubjective Context' [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08, 17(2): 535–543.

[25]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76.

[26]Herschbach, M.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and Dual Process Theories of Mindreading'[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15, 36: 483–497.

[27]李中良. 他心通达的三重境界[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5）: 52–59.

[责任编辑　孟建伟]

JDN